

中国城市单位制研究进展

刘天宝, 柴彦威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现现代化而在城市构建的基本工具,其研究是理解历史、解读转型的重要视角,其积极因素将构成规划城市未来的重要理念。单位制研究已有30年的历史,涉及社会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多个学科。总体而言,单位制度研究比较成熟,单位空间和社会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相对不足。单位制度起源研究有路径依赖、资源约束等视角,但确切性还不充分。单位制度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划分还未形成统一的看法。转型以来,不同类型的单位之间分化明显,不同类型的单位均有研究,但整体的判断还不明确。空间研究中,物质空间研究成果较多,但解释不足,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相对缺乏。从单位制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型得以广泛关注,但转型的路径、阶段、机理及其影响、优化策略等还有待深入探讨。

关键词: 单位;制度;空间;社会

中图分类号: K901;C912.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363(2013)05-0013-09

0 引言

单位制是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在城市构建中通过管理和控制人力及物质资源以实现共产主义和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基本工具,其最基本的外在表现是“城市基本单元”,体现在组织管理、单位空间和居民生活等几个方面,即单位的制度性、空间性和社会性。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构成了中国城市社会运行的基本架构。因此,单位制构成了理解新中国第一个30年城市历史的钥匙。

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组织城市生产和生活以及提升国家实力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生产方面,国家通过单位制实现了有限资源的集中使用,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发展;在组织方面,不仅改变了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在社会动员、男女平等方面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在社会生活方面,单位为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和福利保障,避免了两极分化等许多城市病的发生,同时塑造了单位成员的地方感、单位情结以及国家意识、集体观念;在空间方面,单位大院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并推动了城市空间在老城区外围的扩展^[2];从国家角度来讲,单位建设对改善区域差异、促进现代化和科技进步以及国际影响力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在单位实践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居民生活方面,塑造了封闭狭隘的社会生活空间和比较一致的生活方式^[3],居民的选择性和生活的丰富性

不高,并产生了“单位人”的惰性;空间方面,单位空间的对外排斥性和单位布局的不合理降低了城市空间的利用效率;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主要涉及单位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之能力的衰减^[4]、单位利益分化^[5]以及效率低下、“单位主权”对国家权威的消解、体制内腐败^[6]等。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及对其判断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加深,我国开始施行制度变革,中国进入转型期。中国的转型期是在以单位为组织模式的社会中逐渐注入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力量而产生的渐进式变迁,主宰这一过程的是相互作用的两股力量,即单位制的历史惯性和活跃的市场化等新生力量,原有单位制的变迁是这一过程的重要表征。因此,单位制便成为解读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视角。另外,在今后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借鉴应用单位组织的积极因素为单位制研究注入了鲜明的实践特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单位制研究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涉及社会学、地理学、规划学、经济学及管理等多个学科,研究内容涵盖了单位制度、空间和社会的多个侧面。但对单位制研究进行跨学科、整体性评述的还很少,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单位制研究的状况。因此,本研究对已有单位制研究进行跨学科的梳理,从单位制度、单位空间和单位社会3个基本维度对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发现已有研究的整体特点,并对地理学可能进行的研究进行展望。

1 单位制度研究

1.1 单位制度起源研究

1.1.1 路径依赖视角。单位体制成因有2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分别为路径依赖效应和资源约束因素^[7]。前者主要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影响和传统文化中权威观念的作用^[8]。此外,东北老工业基地“典型单

收稿日期: 2012-04-28; **修回日期:** 2013-05-1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11AZD08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071102)

作者简介: 刘天宝(1976-),男,河北保定市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市社会地理研究,(E-mail) liutb5678@163.com。

位制”的起源和推广对单位制形成的作用也得到了关注^[9]。但该视角的分析只强调了这些因素与单位相似的一面,没有指出单位与这些因素在目标、构建主体、具体制度、空间思想以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差别,从而不能明确单位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1.1.2 资源约束视角。该视角的分析主要强调了建国后我国物质资源不足的现实对于单位制形成的影响^[10],从总量上来说是一种“绝对短缺”的状态,但这种物质资源短缺也具有人为效果,是工业模式和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11-12],是一种“相对短缺”的状况。另外,建国后特殊的国际背景是推动中国实现全国动员、建设单位制的重要因素^[1]。这些因素的分析以理论推测为主,没有指出其与单位建设的直接联系,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从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过程进行分析,从而找到这些约束条件与单位形成之间的确切关系。

1.1.3 多因素视角。多维分析发现单位制的形成主要受到了新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特点、工业化模式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矛盾、对官僚体制和法制的破坏 3 个方面作用的影响^[12],同时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逻辑起点、历史起点、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4,13]各不相同。但分析并没有涵盖单位空间和单位社会。更宽广的视野发现中国古代的建筑与文化、共产党革命的实践和空间规划思想 3 个方面构成了单位制产生的原因^[14]。研究虽然强调了空间视角,并将单位形成的影响因素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进行了延展,但对于影响因素和单位制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和机理还分析不够,确切性不足,多因素的分析对于不同因素之间关系的探讨也需要加强。另外,社会思想演化的历史过程^[15]和结构主义视角的解读^[16]丰富了单位制的起源研究。总体而言,单位制的起源研究大多从制度入手,从多方面探究了其影响因素。一方面,这些影响因素需要一个框架进行整合,以增强理论的系统性;另一方面,需要将单位制视为一个综合体,对其起源进行跨学科的探索。

1.2 单位制度及其变迁研究

1.2.1 单位体制形成及演化的阶段。单位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产生,但其直接影响因素在建国之前,间接影响因素则更为久远。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复杂多变的环境增加了单位阶段划分的复杂性。关注的时间段既有转型前的长时段也有 1949—1957 年这个特殊阶段,既有 3 个阶段的解构也有 4 个阶段的解剖^[1,12-13]。这些研究关注的仍然是单位制度,并从建国后开始考虑,划分的标准也从制度安排出发,而从多维视角并将建国前后联系起来的阶段划分还不足。

1.2.2 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对单位制度的研究存在着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和强调单位内部权力关系和行动逻辑的微观研究 2 个方面。前者将单位视作一个整体,分析其制度框架、变化等;后者将单位打开,分析其内部的社会关系及行为方式。社会组织的视角将单位的组

织形式定位为“单位体制”^[17],并强调了单位在构建国家—单位—个人的体系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18],同时形成了国家—民众的二层次结构^[19]。单位制度体系本身及其形成和变迁过程则进一步细化了单位体制及其变迁研究^[5]。另外,将单位制定义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单元并探讨其等级、结构、功能及变化引发了对城市社会组织模式的思考^[4]。这些研究直接面对单位制度的体系,对单位制度与计划经济等国家层面制度之间的关系探讨不足。单位制作为城市社会经济运行的架构影响深远,国际比较的视角发现中国单位之间的流动性很低^[20]。单位性质和单位级别对集体抗争具有分割效应^[21],单位制度对社会资本形成会产生制约^[22]。另外,单位作为一种制度构建的初始意图和意外后果也受到了关注^[6]。这些研究将构建单位制度的思想与单位的实践结合起来,加深了对单位制度的理解,但对单位制度作为整体产生的影响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

转型期以来,中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在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单位自主性、“内部人控制”与法团主义等的分析发现了单位制度的显著变化^[19],但哪些东西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是很重要的^[23]。总体而言,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将并存并相互影响,短期内不会彻底改变^[24]。基于变化,“新单位制”的概念被学者抛出^[25],其实质是传统单位体制中由外部化管理的、以再分配为主的全民所有制转变为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特定的行业集团所有制^[7]。另外,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群体、人与单位关系以及单位的社会福利功能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6-30]。更有意思的是,在分析海淀区高科技企业的过程中发现了单位制度特征的再生^[31]。但由于单位类型的多样性和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转型期的单位分化明显,因而要想弄清楚单位制度的变迁方向就需要从单位类型入手。另外,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单位制度变迁的描述性研究,注重现象而弱化了机理。

1.2.3 单位内部组织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组织和权力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新制度主义和文化决定论两种取向进行分析^[7]。前者主要指沃尔德的新传统主义分析^[32-33]。但该视角的分析假定领导是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整体,忽视了普通群众对领导的限制^[7]。另外,新传统主义之后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值得关注^[34]。另一方面的研究是自下而上对普通成员在制度约束下行动选择的关注^[35]。如果能实现两方面的结合,对单位内部权力关系较为完整的认识将会形成。

从资源与交换的角度发现了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36-39],但不同单位类型和组织形式对单位成员的行为取向具有差异化的影响^[40]。加入空间概念后,则发现了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职能部门独特的分布特征^[41]。另外,单位意识及其变迁也得到了探讨^[42]。更具人本色彩的分析从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

分析了单位成员的不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43-45]。但除了不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之外,单位成员的感受和心理是多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扩展。

对转型期背景下单位内部权力和行为研究的总结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7]。一种观点认为制度环境的改变必然带来单位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迁^[27,46-47]。另一观点认为基于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虽然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但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并存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发生变化^[48-49]。实证研究更倾向于第一种视角的分析^[50-53]。当然,由于转型期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分化日益鲜明,需要对不同的单位区别对待。不同类型企业下岗名单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差别^[54]。而对于单位内部的关系、活动的宣传和组织以及住房搬迁等的调查研究则反映了单位内部权力和行为变迁的复杂性^[55-58]。单位制度变迁下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但需要将已发生变化的和未发生变化的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关注变化的程度以及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差别,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变迁的走向。

1.2.4 单位制度及其变迁的影响。单位制度及其变迁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维和深刻的,其中社会分层受到的关注最多,并形成了不同的解释理论。转型期之前,单位是影响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59-60],同时关系、党员身份和就业政策等也发生作用^[61]。但由于数据获取以及历史问题研究难度的影响,对于分层的程度及其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转型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62],社会多元化日渐鲜明。在此背景下,社会分层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分歧在于对制度变迁机制解释的不同思路^[63],争论围绕市场变迁理论展开^[60],争论的总体情况在2008年得以总结^[64]。相关研究不仅涉及了单位与分层的关系,还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及机理,加深了对社会转型的认识。但百家争鸣的状态也说明了现有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的转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转型过程是一个更加市场化的过程,政府职能除了退出还有加强^[65],市场力量强化的同时,再分配及单位的作用仍然巨大^[66-69],因此复杂的中国转型、单位变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必定也是复杂的,需要复杂的理论模型和制度分析^[70]。

单位制度及其变迁影响的其他方面包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业、男女平等、住房等^[71]。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和公共精神生活的衰落及自由职业者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72]。随着单位制度的变革,就业中的平等问题也被涉及^[73-74]。但相关的研究还比较肤浅,需要在实证和理论总结方面加强。单位制度变革过程中住房制度的改革对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多重影响。不仅有单位之间、人群之间的差异,还涉及通勤、公共服务等,并造成代际传递^[75]。在此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住房

制度产生了差异性的评价^[76]。转型期住房供给模式的变化多从土地市场、资金投入、住房分配等方面形成解释^[77],但理论性总结还有所不足。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不同类型的单位入手,摸清转型中住房提供模式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出发,探讨适合社会需求的住房提供模式。另外,单位制度变革及市场机制的发育所导致的体制内外差异、第二职业以及居民对基层治理的态度等也被学者关注^[78-79]。单位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多维和相互交织的,并且随着转型的深入,会出现新的发展变化。已有研究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解释,这一研究过程将随着转型的进行进一步深入。

2 单位空间研究

单位空间是单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得以存在的载体,其研究主要涉及地理、建筑、规划及受空间转向思想影响的社会等学科。其中,单位制度对于解释中国城市转型意义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强调从制度变迁透析城市空间的演变,涉及土地利用、居住空间和行为空间等方面^[2,80]。另外,空间本体论角度的单位制空间研究的内容和尺度提升了单位空间研究的系统性^[81],接下来将以此为框架展开单位空间研究的梳理。第一空间为物质空间,从单位大院的形态、建筑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展开。第二空间为精神空间,是对现实空间的构想。第三空间研究从差异、斗争和改造等视角理解单位空间,但目前很少有研究,在此不作评述。

2.1 第一空间

单位—物质空间的研究从城市和单位大院两个尺度展开,前者不仅指出单位空间是城市空间构成的基本单元和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2],还塑造了城市的形态和肌理,包括单位空间分布的秩序与规律性和对城市天际线的影响^[82]。从效果上来说,单位大院的不同组合对街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既有单调闭合的院墙,也有热闹的生活空间。在街区和城市尺度上既有混乱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的秩序与规律^[83]。但单位用地割据却造成土地浪费、不公平竞争、效率低下,并妨碍空间要素的优化配置^[84]。这样,单位大院分解、融入城市空间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85],可能遇到的困难包括居住、交通、行为习惯等,因此需要从制度建设和规划策略方面推动这一过程^[84,86],实施的原则包括市场化、整体性、开放性等^[87]。在此过程中,如何保持单位的亚文化特色以及协调单位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构成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87]。但单位空间的组织模式并非没有优点,柴彦威等在对比了单位制社区和分区制的空间后,提出了借鉴单位职住接近的理念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的构想^[88]。

相对而言,单位大院尺度的物质空间研究更加具体,案例研究丰富。研究内容包括单位大院的空间形态、结构、变迁的模式和过程,但机理性解释还不够充

分。单位空间整体具有封闭性、复合性和复杂性等特点^[83,89]。单位大院的空间结构研究涉及空间分区和轴线。单位空间主要包括前院(生产区)和后院(生活区),从前院到后院单位空间逐渐变得私密性更强,同时重要性也有所下降,继承了古代诸如衙门、学府等空间布局的特点^[89],但与皇城相比则具有开放性和接近群众的特点^[14]。轴线是单位的主入口、广场、主要建筑等构成的直线型的空间布局特征,有些单位大院还具有次轴线。

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转型期以来,单位空间从整体到局部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单位空间与城市空间关系来看,其变化有膨胀扩张、蚕食缩小和向外搬迁等模式^[90],单位的院墙随着单位开放性的增强逐渐虚化,甚至拆除,围合度不断下降^[91]。单位大院内部则有增建新建、拆旧建新等活动发生^[99]。与此同时土地利用的结构也不断调整,如有些单位工业仓储减少而居住商服增加,土地利用的混合度也有所提高^[91]。当然,这些变化过程在单位之间差异显著,与单位的职能、区位等有关^[87],有些单位空间得到了继承,有些则会弱化,有些则完全消失。集而言之,物质空间的已有研究侧重描述而解释不足。进一步的研究一方面需要从历时性的视角对其变迁进行细致刻画,另一方面需要从规划、管理及政治经济视角对其进行解释,从而加深对城市空间组织模式的理解。

2.2 第二空间

对现实空间的构想包括两种视角,一种从功能和意义的角度理解空间,理解空间的社会性与社会的空间性及其相互关系;另一种构想打破了静态的方法论,认为空间是各种流组成的。对于单位空间研究,前者以社会空间为切入点展开,后者从动态和联系的角度理解单位空间,研究内容涉及单位人的行为、单位物质、资金和信息的“流”等所组成的空间。

2.2.1 单位社会空间。单位社会空间的研究涉及社会空间的特征、机理及其变化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少。研究发现,单位在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丰富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资源的同时极大地限制了居民自主选择生活的权利和机会,并形成了一种封闭、狭隘的社会生活空间^[3];但另一方面,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促进了居民的交流与互动,对于维权等集体行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92]。单位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空间是在决策权高度集中、以行政命令实施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土地公有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下形成的,既是生产的单元也是社会管理的单元,同时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93]。相对而言,面向单位社会空间本体的研究则还没有,单位社会空间的职能和结构是怎样的、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如何相互影响、社会空间与居民行为之间有哪些的互动模式等问题还有待回答。从城市的尺度来看,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空间组织形成了3个层级的生活圈,即由单位构成的初级生活圈、同质单位构成的低级

生活圈和以区为基础的高级生活圈^[94]。

转型期以来,中国城市空间逐渐从均质走向异质和多元。单位空间的转型则是此过程的缩影。研究发现,一方面单位空间和社区特点对于构建退休者社区和基于新单位制的低碳城市空间组织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单位居民的迁居对于重塑城市社会空间具有重要影响^[95]。对于单位制社区来说,过滤与残留有重要的塑造作用。计划经济时期只存在单位内部的过滤,转型期则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过滤现象,但单位制社区的过滤具有复杂性和多方向性^[96]。影响残留的不仅有单位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单位的类型也有重要影响^[97]。作为一种结果,单位制社区在转型的形塑下,人口逐渐杂化,住房产权逐渐多样化,同时服务设施不断外向化^[98],单位制社区不断融入所在的城市空间。

另外,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单位制和社区制构成了我国两大重要模式^[99]。单位制空间是国家政权的全能空间,透过单位制,国家的政治空间弥漫于整个社会,构成了“单元化隔离”的间接治理模式。社区空间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空间,围绕政府与社区自身力量的互动关系形成政府主导型、社区自治主导型和混合型的治理结构。从单位制空间到社区制空间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从城市为居民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空间角度来看,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供给空间的模式也发生了调整,但对合肥市部分单位居民的调查发现,单位作为就业地的核心作用依然有所体现,其典型模式为“核心—外围圈层”结构^[100]。

2.2.2 单位流动空间。单位流动空间目前主要为单位居民的行为空间,包括短期的日常出行和长期的迁居两个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从转型期单位居民与其他类型居住区居民通勤及日常出行比较的视角展开。研究发现,单位居民的通勤距离相对较短,更多使用非机动车通勤工具,通勤时间也相对较短^[101]。由于职住接近、土地紧凑和设施完备等空间特点,单位居民的日常出行具有低碳的特征^[102-103]。而随着单位制度解体,单位居民的通勤距离和出行总量都有所增加^[104]。以上研究主要采用了定量模型的分析方法,而定性角度的分析发现了单位空间对居民行为空间的限制作用,认为单位空间中的时间利用、单位设施的供给以及单位空间的管制等是主要因素^[44]。另外,作为长期行为的单位居民迁居研究发现单位居民的迁居经历了以住房资格为中心的单位主导迁居和以需求和支付能力为取向的市场引导迁居两个阶段^[105],得出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居民行为模式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3 单位社会研究

单位社会研究是在我国城市居民居住及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向的背景中展开的,主要涉及历时性的发展过程研究,从单位制到社区制转变所涉及的组

织、管理、社会整合等研究和社区建设研究等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中,不同学者理解与用词有所差别。对基于单位制的城市居民居住及管理称为单位或单位社区;对当前正在建设的基于城市的属地化管理和居民自治相结合的居住及管理模式称为社区或城市社区。在此,将前者称为单位制社区,后者称为城市社区。

3.1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社会基层管理转向

一种分析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基层管理是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的发展转变过程^[106]。单位制在政治动员、经济发展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产生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等制度性后果。街居制则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创立阶段、大跃进时期的膨胀阶段、文革时期的曲折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的恢复和发展阶段。但街居制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面临职能超载、角色尴尬等问题。这样,社区制作为对单位制和街居制的超越和重整浮出水面。另一种分析将街居制归入社区制的范畴,认为当前社区建设是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107]。从单位制与社区制的关系看,20世纪50年代单位制和社区制齐头并进;到60、70年代单位制社区化和社区单位化双向发展,法定社区被边缘化;90年代以来则是社区向主导地位回归的第三阶段。

差异化对待街居制的分析方式说明对单位制社区、街道居委会和城市社区的认识还不够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待梳理。这些问题的回答又涉及到当前中国提倡的社区建设和西方城市社区有何异同。因此,需要面向单位制社区、街居制和城市社区的本体,将其置于中国的历时性语境中进行分析,进而明确其组织结构、管理结构、居民角色等关键问题。

此外,从社会整合、以人为本、党政分开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求来看,城市社区发展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108]。单位制社区被认为是非现代的城市要素,所形成的亚文化是反城市性的,只有社区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109]。虽然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认可,但如何防止将社区建设成为新的单位以及避免社区自发分化有可能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值得担忧^[110-111]。

3.2 基层管理模式转型的多维过程

从单位制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是一个多维、非线性过程。首先,这是社会整合机制的转变,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结构^[112]。在此过程中双重体制会导致失范效应,需要从社会服务、政府管理等方面促进转型的顺利进行。其次,这一转变是社会生活组织模式的重建。但工作单位在摒弃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后,完全可以保留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而认为向街道放权就可以顺利实现单位向社区的组织重建是十分幼稚和片面的^[113]。再次,这也是社会调控方式的转变,将实现从政府的单线调控到以“行政区—社区”为基础的政府与社会双线调控的转变,其中

的双线平衡是社区发展的关键^[114]。从社区治理结构来看,这一转变过程是社区管理单位化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体联动、共同参与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115]。最后,这一转变还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和社会支持网络模式变迁的过程^[116-117]。期间可能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解决之道在于多元供给机制的构建。

从微观个体视角来看,单位制社区向城市社区的转变过程则是单位人向社会(区)人的转变过程^[118]。另外,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特殊的区域来说,社区发展与国企改革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了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两项核心内容^[119]。但与中国进行社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比,上述研究还不足以指导城市社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回答建设的社区是怎样的,即目标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梳理和总结单位制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的路径,发现问题,并找到纠正的办法,即道路的问题。上述两方面相互关联,是推动单位制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实现从转变的“共识”向转变的“现实”跨越的关键环节。

3.3 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的策略多与现有社区发展中的问题分析相关。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建设存在推动力不足、“逆非单位化”现象和社会“公共空间”进程缓慢等问题,社区建设需要行政力量的主导作用^[118]。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中“单位记忆”根深蒂固,而“社区记忆”缺失是社区建设的障碍,需要调动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来重建社区记忆^[120]。行政机制制约、法律建设滞后等问题的解决需要协调政府、企业 and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多元共治模式^[121]。随着城市社区建设,单位型社区向阶层性社区转化,以及单位制社区底层化也是重要的问题^[122-123]。另外,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也得到了总结和梳理,包括目标模式、制度创新和可行性等几个方面^[124]。值得强调的是,不同类型的单位制社区面临差异化的转型路径,案例分析是总结经验、梳理模式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案例研究比较分散,在研究数量和挖掘深度方面都需要加强。进一步的研究需要一个包括案例选择、路径分析、模式总结、效果评价、问题查找、原因探究和策略分析在内的理论性架构来进行统领,以便从整体上把握社区建设的情况,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指导城市社区的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单位制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基本单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经历了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单位化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第二个30年经历了逐渐解体的去单位化过程;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对单位制进行辩证思考并将其积极理念运用到社会重建和和谐社会建设中去是单位制理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经

历扬弃和发展、形成新单位主义的过程。因此,单位研究不仅是反映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的镜子、解读中国城市转型的钥匙,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

相对于单位空间和社会研究,单位制度研究比较成熟,有更多的理论成果,而将单位制中的积极理念用于二次转型与社会重构的实践性研究则刚刚露出端倪。在单位制度研究中,制度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比较丰富,而单位制度的起源研究在时间跨度、多维理解和确切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单位空间研究方面,物质空间研究较多,但缺乏长时段的过程性研究,同时解释性研究也不足。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相对较弱,在案例、解释和理论方面都存在欠缺。同时,概念化与理论化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单位社会研究围绕从单位制社区到城市社区展开,但在如何对待单位因素、构建怎样的城市社区方面还没有找到统一的答案。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已有研究的实证特色鲜明,结构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相对不足。

未来单位研究可以在单位化、去单位化和新单位主义构成的长时段历时性框架中展开,从制度性、空间性、社会性以及支撑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性等维度展开。单位化研究注重单位制度、空间及社会的形成过程、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并对单位制的作用进行辩证评价。去单位化研究解读单位制的解体过程、空间演变及单位制社区转型,分析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并探讨与其相伴的社会问题。新单位主义研究将单位置于社会重建的现实语境中,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置考虑,分析单位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及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实现方式,为下一阶段城市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在这一整体性的框架中,地理学从空间视角切入,将单位制理解成城市社会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在此基础上描述单位化时期和去单位化时期单位在社区、单位、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的表现,挖掘现象背后的机理,并对相应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变迁在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评价,进而找到适合我国下一时期城市发展需求的合理性因素,探讨其可能的应用途径,突出单位制研究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田毅鹏,刘杰.“单位社会”历史地位的再评价[J]. 学习与探索,2010(4): 41-46.
- [2] 柴彦威,陈零极,张纯.单位制度变迁:透视中国城市转型的重要视角[J]. 世界地理研究,2007,16(4): 60-69.
- [3] 揭爱花.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空间[J]. 浙江大学学报,2000,30(5): 76-84.
- [4] 刘建军.单位中国——社会调控体系中的个人、组织与国家[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5] 周翼虎,杨晓民.中国单位制度[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6] 仁学丽.单位制度的初始意图与意外后果[J]. 理论探索,2010(5): 111-114.
- [7] 李路路,苗大雷,王修晓.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J]. 社会,2009,29(4): 1-26.
- [8] Lü Hsiao-bo, Perry E J. 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7: 21-90.
- [9] 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7(4): 56-62.
- [10] 王沪宁.社会资源总量与社会调控:中国意义[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2-11.
- [11] Lu Duanfang. Remaking Chinese Urban Form: Modernity, Scarcity and Space, 1949—2005 [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2] 路风.中国单位制度的起源和形成[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13(4): 66-87.
- [13] 刘建军.中国单位制度的构建与“革命后社会”的整合[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0(5): 24-30.
- [14] David Bray. 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5] 田毅鹏,刘杰.“单位社会”起源之社会思想寻踪[J]. 社会科学战线,2010(6): 165-173.
- [16] 刘天宝,柴彦威.结构主义视角下中国城市单位制的形成逻辑[J]. 人文地理,2012,27(1): 34-38.
- [17]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J]. 中国社会科学,1989(1): 71-88.
- [18] 李路路.论“单位”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2(5): 23-32.
- [19]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17-245.
- [20] 安德鲁·沃尔德.关于中国城市中工作单位制度的经济社会学研究[J]. 国外社会学,1991(5): 26-32.
- [21] 冯仕政.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J]. 社会学研究,2006(3): 98-134.
- [22] 陈凤兰,黄永斌.单位制度对我国社会资本形成的制约[J]. 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报,2006(4): 81-85.
- [23] 李汉林.变迁中的中国单位制度:回顾中的思考[J]. 社会,2008,28(3): 31-40.
- [24] 李汉林.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7(4): 46-55.
- [25] 刘平,王汉生,张笑会.变动的单位制与体制内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为例[J]. 社会学研究,2008(3): 56-80.
- [26] Rocca Jean-Loui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and the Chinese State [J]. China Information, 2003, 17(1): 1-27.
- [27] 曹锦清,陈中亚.走出“理想”城堡——中国单位现象

- 研究[M].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
- [28] 何重达,吕斌. 中国单位制度社会功能的变迁[J]. 城市问题,2007(11):48-56.
- [29] Lee Ming-kwan. Chinese Occupational Welfare in Market Transition[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 [30] Gu E X. Dismantling the Chinese Mini-welfare State? Market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1979—1999[J].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1, 34(1):91-111.
- [31] Fracis C B. Reproduction of Danwei Institutional Fe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The Case of Haidian District's High-Tech Sector[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6, 147(3):839-859.
- [32] 魏昂德.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M]. 龚小夏,译.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 [33] Walder A G. Organized Dependency and Cultures of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3, 43(1):51-76.
- [34] 李路路,王修晓,苗大雷. “新传统主义”及其后——“单位制”的视角与分析[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49(6):5-16.
- [35] 李猛,周飞舟,李康. 单位:制度化组织的内部机制[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 1996, 16(5):135-167.
- [36] 李汉林,李路路. 资源交换——中国单位组织中的依赖性结构[J]. 社会学研究, 1999(4):44-63.
- [37] 李路路,李汉林. 中国的单位组织:权力、资源与交换[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38] 李路路,李汉林.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6):90-105.
- [39] 李路路,李汉林.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与行动方式[J]. 东南学术, 2000(2):18-23.
- [40] 胡伟,李汉林. 单位作为一种制度——关于单位研究的一种视角[J]. 江苏社会科学, 2003(6):68-75.
- [41] Bjorklund E M. The Danwei: Socio-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Units in China's Urban Society[J]. Economic Geography, 1986, 62(1):19-29.
- [42] 于显洋. 单位意识的社会学分析[J]. 社会学研究, 1991(5):76-81.
- [43] 李汉林,渠敬东. 制度规范行为——关于单位的研究与思考[J]. 社会学研究, 2002(5):1-22.
- [44] 李汉林,李路路. 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单位组织中依赖结构的主观层面[J]. 社会学研究, 2000(2):1-17.
- [45] 李汉林,渠敬东. 中国单位组织变迁过程中的失范效应[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46] Lee Ching Kwan. The Labor Politics of Market Socialism[J]. Modern China, 1998, 24(1):3-33.
- [47] Lee Ching Kwan. 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 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9, 157(1):44-71.
- [48] Dickson B J. What Explains Chinese Political Behavior? The Debate over Structure and Culture[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92, 25(1):103-118.
- [49] 汪和建. 自我行动的逻辑 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社会构建[J]. 社会, 2006, 26(3):24-47.
- [50] 刘爱玉. 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的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6):1-12.
- [51] 游正林. 也谈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兼评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J]. 社会学研究, 2005(4):207-220.
- [52] 丘海雄,许扬先,赵巍.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转型的过程、原因及结果[J]. 社会学研究, 1997(2):83-92.
- [53] Zhao Minghua, Nichols T. Management Control of Labour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Cases from the Textile Industry[J]. The China Journal, 1996(36):1-21.
- [54] 李钊金. 车间政治与下岗名单的确定——以东北的两家国有工厂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3(6):13-23.
- [55] Agelasto M. Cellularism, Guanxiwang, and Corruption: A Microcosmic View from within A Chinese Educational Danwei. [J]. Crime, Law & Social Change, 1996, 25(3):265-288.
- [56] Erwin K, Adams V, Le P. Glorious Deeds: Work Unit Blood Donation and Postsocialist Desires in Urban China[J]. Body & Society, 2009, 15(2):51-70.
- [57] Unger J, Chan A.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An Urban Chinese Work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Employee Influence on Decision Making at A State Owned Factory[J]. The China Journal, 2004(52):1-24.
- [58] Dittmer Lü, lu Xiaobo. Personal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Danwei under Reform[J]. Asian Survey, 1996, 36(3):246-267.
- [59] 李路路,王奋宇. 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60] 边燕杰.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61] Bian Yanjie. Work and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 [62]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等.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 1994(2):47-62.
- [63] 周雪光. 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J]. 社会学研究, 1999(4):26-43.
- [64]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 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65] Wu Fulong. China's Changing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 Transition Towards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J].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071 - 1093.
- [66] Wu Xiaogang. Work Uni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Effect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Urban China [J]. *Social Forces*, 2002, 80(3): 1069 - 1099.
- [67] Bian Yanjie,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5): 739 - 758.
- [68] Xie Yu, Wu Xiaogang. Danwei Profitability and Earnings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J]. *China Quarterly*, 2008, 195: 558 - 581.
- [69] 边燕杰, 李路路, 李煜, 等. 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5): 100 - 110.
- [70] Zhou Xuegua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135 - 1174.
- [71] 仁学丽. 从基本重合到有限分离: 单位制度变迁视阈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3): 46 - 49.
- [72] 田毅鹏, 吕方. 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9, 49(6): 17 - 23.
- [73] 郝大海, 王卫东. 理性化、市场转型与就业机会差异——中国城镇居民工作获得的历时性分析 (1949—2003)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3): 140 - 151.
- [74] 揭爱花. 单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城市女性发展障碍 [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 33(4): 121 - 129.
- [75] 武中哲. 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及其分层效应——基于单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 [J]. *社会科学*, 2010(1): 71 - 77.
- [76] 李斌, 周红金. 中国城市单位职工对住房制度改革结果的主观评价 [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19(3): 111 - 115.
- [77] Zhou Min, Logan J R.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Housing in Urba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96, 20(3): 400 - 421.
- [78] Romich M F. Decentralisation and the Danwei System: Economic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ities [J]. *China Report*, 1994, 30(4): 447 - 457.
- [79] Chen Jie, Lu Chunlong, Yang Yiyin. Popular Support for Grassroots Self-government in Urban China Findings from A Beijing Survey [J]. *Modern China*, 2007, 33(4): 505 - 528.
- [80] 柴彦威, 刘志林, 沈洁. 中国城市单位制度的变化及其影响 [J]. *干旱区地理*, 2008, 31(2): 155 - 163.
- [81] 刘天宝, 柴彦威. 地理学视角下单位制研究的内容、意义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31(4): 527 - 534.
- [82] 郭湛. 单位社会化 城市现代化——浅谈单位体制对我国现代城市的影响 [J]. *城市规划汇刊*, 1998(6): 60 - 65.
- [83] 乔永学. 北京“单位大院”的历史变迁及其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 [J]. *华中建筑*, 2004, 22(5): 91 - 95.
- [84] 范炜. 单位用地割据——当前城市管理中面临的难题 [J]. *城市规划汇刊*, 2002(6): 76 - 79.
- [85] 张帆. 单位大院的分解之路(之一) [J]. *北京规划建设*, 2006(2): 67 - 70.
- [86] 张帆. 单位大院的分解之路(之二) [J]. *北京规划建设*, 2006(3): 89 - 91.
- [87] 任绍斌. 单位的分解蜕变及单位大院与城市用地空间的整合 [J]. *规划师*, 2002, 18(11): 60 - 63.
- [88] 柴彦威, 张艳.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重新审视中国城市单位社区 [J]. *国际城市规划*, 2010, 25(1): 20 - 24.
- [89] 张艳, 柴彦威, 周千钧. 中国城市单位大院的空间性及其变化: 北京京棉二厂的案例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5): 20 - 27.
- [90] 王乐, 梁江. 单位大院的形态演变模式分析 [J]. *华中建筑*, 2010(7): 151 - 154.
- [91] 张纯, 柴彦威. 中国城市单位社区的空间演化: 空间形态与土地利用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5): 28 - 32.
- [92] 李怀. 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建构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9(6): 158 - 164.
- [93] 马学广. “单位制”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0, 30(9): 1456 - 1461.
- [94] 柴彦威. 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 [J]. *地理研究*, 1996, 15(1): 30 - 38.
- [95] 柴彦威, 塔娜, 毛子丹. 单位视角下的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3): 5 - 9.
- [96] 塔娜, 柴彦威. 过滤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单位社区变化研究 [J]. *人文地理*, 2010, 25(5): 6 - 10.
- [97] 张纯, 柴彦威. 中国城市单位社区的残留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5): 15 - 19.
- [98] 张纯, 柴彦威, 陈零极. 从单位社区到城市社区的演替: 北京同仁堂的案例 [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5): 33 - 36.
- [99] 侣传振, 崔琳琳. 从单位制到社区制: 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 [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20(5): 632 - 636.
- [100] 徐晓燕. 单位社区嬗变中城市供给空间模式的转变——基于对合肥市的实证研究 [J]. *华中建筑*, 2011(1): 31 - 34.
- [101] 张艳, 柴彦威.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 [J]. *地理研究*, 2009, 28(5): 1327 - 1340.
- [102] 柴彦威, 肖作鹏, 刘志林. 基于空间行为约束的北京

- 市居民家庭日常出行碳排放的比较分析[J]. 地理科学, 2011, 31(7): 843 - 849.
- [103] 马静, 柴彦威, 刘志林. 基于居民出行行为的北京市交通碳排放影响机理[J]. 地理学报, 2011, 66(8): 1023 - 1032.
- [104] Wang Donggen, Chai Yanwei. The Jobs-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in Beijing China: The Legacy of Danwei[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9, 17(1): 30 - 38.
- [105] 柴彦威, 陈零极. 中国城市单位居民的迁居: 生命历程方法的解读[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5): 7 - 14.
- [106] 何海兵.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 从单位制、街居制到社区制[J]. 管理世界, 2003(6): 52 - 62.
- [107] 华伟. 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 50 年变迁[J]. 战略与管理, 2000(1): 86 - 99.
- [108] 李培林. 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J]. 学习与实践, 2005(11): 17 - 21.
- [109] 王慧玲. 定居城市——从单位部落走向社区[J]. 城市问题, 1997(4): 26 - 29.
- [110] 轩明飞. 从“单位”到“社区”——困厄还是出路?[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03, 24(2): 105 - 109.
- [111] 邓晓梅. 从单位社区到城市社区[J]. 规划师, 2002, 18(8): 9 - 12.
- [112] 李汉林. 中国单位现象与城市社区的整合机制[J]. 社会学研究, 1993(5): 23 - 32.
- [113] 卢汉龙. 单位与社区: 中国城市社会生活的组织重建[J]. 社会科学, 1999(2): 52 - 55.
- [114] 张丽梅. 社会调控体系下单位社区发展研究[J]. 规划师, 2005, 21(10): 88 - 91.
- [115] 郭凤英, 陈伟东. 单位社区改制进程中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1, 38(1): 44 - 48.
- [116] 郝彦辉, 刘威. 制度变迁与社区公共物品生产——从“单位制”到“社区制”[J]. 城市发展研究, 2006, 13(5): 64 - 70.
- [117] 李培林. 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J]. 江苏社会科学, 2001(1): 53 - 55.
- [118] 彭穗宁. 市民的再社会化: 由“单位人”、“新单位人”到“社区人”[J]. 天府新论, 1997(6): 49 - 53.
- [119] 田毅鹏. “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制约[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4): 97 - 102.
- [120] 王建民. 去单位化、社区记忆的缺失与重建——资源枯竭型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学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2006(6): 50 - 52.
- [121] 郭凤英. 单位社区的终结和社区治理的转型——以湖北省 X 市 L 集团三个社区为个案[J]. 湖北社会科学, 2007(11): 59 - 62.
- [122] 王美琴, 李学迎. 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与传统单位社区的底层化[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4): 80 - 85.
- [123] 何亚群, 王明生. 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 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J]. 广东社会科学, 2005(6): 148 - 152.
- [124] 陈伟东.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 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J]. 理论月刊, 2000(12): 3 - 9.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Danwei System in Urban China

Liu Tianbao , Chai Yanwei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anwei system is the basic tool constructed in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to achieve Chinese modernity, whose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history and interpret the transition, and whose positive factors will be part of those important urban planning ideas. Danwei system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0 years, concerning sociology, geography, planning, etc. In general, the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as more achievements, and the researches of Danwei space and Danwei society are still in need. The Danwei system origin research has perspective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resource constraint, but without enough tangibility. A uniform opinion of the stages of Danwei system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not come into being. Since the transition, different Danweis have experienced different transitional paths with different effects. Though the existed research has covered different Danweis, a general judgment is not clear enough. As for spatial research, material research has more achievements but still needs more interpretation. Behavior and social space research is not enough relatively. The transition from Danwei community to urban communit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ut the transitional paths, stages, mechanism, effects and optimizing strategies still need more study.

Key words: Danwei; institution; space; society